

## “儒商现象”析

谷迎春

作者认为,“儒商现象”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三次“商潮”。如若将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知识分子划为“五代”的话,当代“儒商”的出现是五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理想与价值取向的一次成“建制”的出新。“儒商”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它把社会改革的经济目标与人文目标结合起来,对减轻“官场”压力、深化教育改革以及重塑知识分子自身有着深刻、久远、始料未及的重要意义。

作者:谷迎春,男,1942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儒商现象,已被社会认可、关注,并有日盛之趋势。这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十分紧要关系,而且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社会阶层变化、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观念、现代企业家队伍的形成,有着始料未及的深刻影响。

儒商现象,缤纷彩呈。有的因行业不同而异,有的因地域有别而殊,有的则因“老总”(对厂长、经理一类实业家的世俗统称)的文化个性而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对此,一时难于也未必急于界说。为了讨论问题,不妨暂做两种假设,或称两种注解。

第一种情况是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对知识分子、知识产权、特别是技术专利的慷慨吸纳。君不见,有的企业以200万元巨资买断一项创意;有的企业分劈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为智力股;有的企业以高薪或持股经营方式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界)招聘总经理;有的企业家处心积虑地四处访贤,渴望“名士”出山;有的企业常年奉养一批“智囊”……还有另一种景象,不少企业以赶时尚的速度建设着企业文化,急不可耐地“拿来”国外的“CIS”等一系列的最新管理理论,从隐到显地用“文化”掌管、装璜着企业自身。这大概可以称为儒商现象的第一注解。

第二种情况是高学历、高智商、“高”地位的文职人员“下海”。这些人不是沾水,不是浅试,不是“业余”,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乃至“痛苦”的抉择,毅然地从高等学府、科研机构、设计室、办公室里走出来,通过竞争应聘、联络关系、同仁创业等渠道跳入“商海”。甚至“脱胎”样地割断与“铁饭碗”的脐带,宁可是实行“一家两制”地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变——成为同行同辈刮目相看的“老总”。这大概可称为儒商现象的第二注解。

两种情况出现的共生现象是,产生了一批不以所有制成分来划分的具有高文化层次、试图与世界接轨、探索建设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行者——企业家队伍的雏型。这些人,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从价值观念到待人处事有了明显的“变异”,他们带着潇洒的笑容,怀着局外人难察的心理压力稳坐在老板桌后的转椅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功了——企业的社会效益和高额利润——美酒、鲜花、主席台、新闻板块。他们以智慧照亮了企业,正躊躇满志地实现着自己。当然也有的屡经挫折,或灰心、归队(据我调查这是少数)或百折不挠重组再创。

粗略地说,儒商现象,或以资本为资本吸纳智慧,“引诱”知识分子“出山”,在企业有了“原始积累”之后实现高层次战略;或是社会给予认可之后,有魄力的儒生以知识为资本自觉“入世”(魄力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要紧的呢,俗话说“智者千虑”哟)这两类儒商现象合流,可谓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这种燃烧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浓重的中国文化特色,这种燃烧让人们借助其耀眼的光亮,洞见一种历史必然以及某些传统观念的转换。

这里我想指出,现在谈“儒商”,往往自然而然地把国有企业经营者以及尚有“国家干部”身分的人排除在外。我不赞成这种无视现实的理解。由国家有领导有组织的企业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在企业转制和培养新型企业家的号召下,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股份制企业的法人代表、合资企业的中方高级管理人员,在经济舞台上的表演毫不比堪称儒商的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应境外独资企业之聘的企业家逊色。只是他们的待遇较为微薄(这应是在中国企业队伍形成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另一种“不公”)而已,因此他们“舍身求法”的精神更为可贵。

儒商现象可说是“士”的分流现象。

“士”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用它代指当代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对于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十年寒窗苦,卖于帝王家”、“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士农工学商”……这一类语汇,恐怕能算得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观念,传统社会的一种“座次表”。由此,也可以推测出,知识分子“下海”何其难哟!可犯难的事却发生了,并正在发展,为什么?我以为起码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 首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粗略算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三次大“商”潮。第一次发生于80年代初期,从个人行为看,主要是下列三种人:被社会“隔离”过而打入社会底层的冤或不冤的“不三不四”者、待业(那时这么称谓)或隐形失业而又对大锅饭不抱幻想的谋生者、从政坛上滑落又不甘寂寞的失意者。他们试想淘金却未料能那么容易的得手。这三种人下海经商的原因、门径、轨迹,极其复杂多样,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电视连续剧的好素材。尽管情况各异,而给予全社会的启示都是共同的:开了风气之先、移动了价值体系座标、传播了初级的商品经济观念、松动了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结构、活跃了沉闷稳定的社会心理,他们用全身心地投入昭示了、实践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件事,对向以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言,不得了,震动大,议论多,“不三不四”的挣大钱之类的民谚其实也包含他们的心声。第二次发生于80年代中期以后,从那时开始,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相继半下海、下海了。“留职停薪”、“以文养文”、“本岗位创收”、“星期天工程师”、“承包经营”……以至于辞职另谋他途。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不过,这时不大自觉地议论演进到自觉地牢骚社会了:分配不公、体脑倒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牢骚,往往也是一种动力,只是它的情绪成份大于理性成份而已,于是出现了“教授卖大饼”的极端现象。这类现象说明内心不平与内心骚动的知识分子尚处于狭隘的“商”的观念,在滔滔“商”海中尚未找到自己的定位。主要不是因为教授智商低,而是因为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知识、管理才能以至技术不值钱、更少有人懂得花钱买“创意”。如果说第一次下海的极少、第二次下海的也有很多不够格者“入列”于儒商队伍之中。那么,发生于90年代初的第三次就不同了。这一次有“成建制”的知识分子下海了。有的科研人员三五成群地被“策反”,有的管理人才自动离去原单位,有的机关公职人员毅然辞去官位,不少的原半下海者彻底与单位脱

钩,包括前面提到的国有企业起用了本单位或外单位的“士”,取代了按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管理者们。可以把这次发生的现象称为社会精英下海。为什么会是这样?概略地说,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更宽松、明确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进展到呼唤文化、知识的份上,提供了崭新舞台;知识分子完成了从骚动到观望,从沉思到抉择第二次“生存竞争”(第一次是十年动乱后的知识分子纷纷“归队”的世风)的心理准备,于是乎,精神、物质利益的两种驱动力,促使社会较大规模地出现了知识分子分流的可喜现象。

### 其次是规律与“心律”的共振

知识分子分流的显著社会效果之一就是本文讨论的儒商现象。换句话说,这种分流促成“儒”“商”合一。在这里把儒置换成士,是无伤宏旨的。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士与商是两立的,两种社会职业,两种社会地位,两种价值体系。当然,史籍也有载,如范蠡之成为陶朱公,集大商富贾当代大儒于一身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就总体而言,“进则仕,退则隐”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梦寐以求的个人理想。用社会学的语言说,这些人几乎是心无旁骛地追求官场上的“垂直向上流动”,隋唐至清末,“士”们皓首穷经终于入科举彀中,涌现“十万进士”可谓佐证。这些历史英才的作用主要在于织成了庞大的社会管理网络,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成就了历代帝王的盛世,甚至促进了几次社会改革,但是对于个人而言,他们的兴奋点却不在合流于“商”。一句话,纵观历史尚未出现过今日之儒商合流的现象。再换句话说,我觉得令今人瞩目的儒商现象,它不仅直接惠济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重撞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古馨,引发出新世纪的巨响。这种巨响,为什么于今日之中国震颤呢?撇开其他不论,只谈一点:现代的、文明的市场经济,不仅凝聚在物质产品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而且经济发展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经济文化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规律,而我们今天搞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的、力图与世界经济接轨、全球合作的,再不能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划一条森严的界限。因此出现了市场经济规律与士的职业追求之统一,即我所谓的规律与“心律”的合拍。

市场经济系资本主义用了近200年时间逐步完善的社会经济运作体制。这种体制因国别、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模式,这种体制因经济领域的复杂情况,积淀了不少的规律。摘其要者,国际通行共识的规律,可以概述为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经济周期规律、平均利润规律。在这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除了经济周期规律之外,诸如价值、供求、平均利润之规律,在机制上和运作上都是以竞争规律为基础,为前提而呈现的。极而言之,就连经济周期也是竞争规律在宏观上积聚起来的社会经济后果的一种极端表现。不必在常识问题上多饶舌,依讨论问题之所需简约地来谈对儒商现象具有支配性作用的规律:竞争。

竞争,这个字眼对于几十年来的中国人真是久违了。(可是,对“斗争”这个字眼人们又熟悉得有点烦了)其实它不是贬字词,而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覆盖广泛的积极字眼。它归根结底的成果是社会效率。舍此,就谈不上社会进步。竞争,对于经济领域,对于“商”而言自然是生产要素配置和投入产出比的角逐,这其中涉及人才、投资、科技水准、生产经营方式……诸事庞杂,一事最要:人才。既忠诚可靠(德)又出办事效率(才),所以人才难得正是就此二者统一而言。这迄今已经成为“商”界共识,既为共识,必有争“人”之战,于是乎士的身价日高,增加了与“商”家合流的“资本”和机遇。

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平等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均等。要让市场主

体参与平等竞争,当然需要民主和自由,并要由法制作保障。那么结论必然是市场经济呼唤社会政治、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精神世界的民主、平等、自由。人们稍一留心地回顾,就可以察觉到,自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来,全社会正大踏步地沿此方向迈进(急性子的人之所以抱怨它步子慢,是因为他们无视中国社会身负的历史包袱)。这是“五四”的光荣历史传统也是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种理想。而这也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理想——实现自己于改造社会之中。为此,如鲁迅先生所说“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如果把这种精神追求人格化为士的“心律”,那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与其恰形成“共振”。

以上约略可以算作知识分子下海的精神动力,或者称为儒商现象形成的一种内在本质。

说到此,前面虽说儒商现象难于界说,而我已经介入“界说”,索性依据调查所得谈一个要点。儒商,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有高文化程度的商(广义)人”,如这么说他们中还有“奸商”哩。儒商,是一批有识之士(并不以文凭和学历为标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理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商海弄潮自我实现的下海人。可以说,他们的一展风采,才使人们半朦胧的创造了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儒商。儒商,不能自诩更不能自命。我认识的一位儒商说,他“以德自律、以才称职、以仁聚贤、以能经营、以义获利、以法护业、以勤补智、以绩取胜”。

**儒商把社会改革的经济目标与人文目标统一起来,儒商把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儒商难当!**

知识分子贵在重精神,讲名节,但也毕竟是趋利避害之凡人。他们清高,却也不甘于清贫。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从物质利益上改革了固有的分配格局,出现了一时难以避开的不公,自然造成不少人的不满,要求用知识的价值改变其穷酸相,这自然是一种基本的驱动力。有的“海中人”对外人羞于言利,大可不必。有些局外人妒嫉其获得,大可不必,再费笔墨去讨论这种驱动力以及它带给全社会的利益也大可不必。

儒商现象,或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分流、分化,虽然是起步伊始,但是比照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跋涉过来的历史进程,它的意义不可小视。让我们先辩证一下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喻知识分子与社会其他各阶级的关系,是给知识分子定性:它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缺少独立性的自由职业群体。由于引用此喻者的权威性,它的衍伸意义也具有权威性了。其实,按社会分层理论,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阶层也是正确的——它的价值、功用、特性、弱点都决定了它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偏颇出在沿用者有意无意地把这个定义凝固化、单视角化。其灾难性后果是忽视了知识分子独具的社会能量、独立人格、生活方式和利益主体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用“工农兵”的利益取代、忽视了知识分子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日渐显示知识的力量、知识分子的重要,因之它的利益主体地位问题也日渐明显。社会发展问题,从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变动来说,是一个分化。所谓分化,用老百姓话说:改革是重切蛋糕。这种看法不仅拓展了人们对“皮毛之喻”的认识视野和深度,而且也是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

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流意义何在呢?我琢磨到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为市场经济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后劲,为与国际市场接轨奠定了人才、智力基础。市场经济的直接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主体。这要积以时日,而在这过程中需要清除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残留观念和传统模式,探索、建立吸纳国外先进经验而又具中国特色

的新模式,而知识分子的投入,恰是集清除者与建设者于一身的力量。

2. 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压力起缓解作用。人才分流有助于解决行政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官多兵少的积弊和包袱。知识分子不挤在“仕宦为途”的独木桥上会减轻“官场”的压力,也有助于政治清正。随着经营管理者地位的保证,社会地位的提高,物质待遇的优厚,可以断言社会精英的职业分流将更加迅速。

3. 为职业教育、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继续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启示了方向,提供了动力。社会对人才的吸纳的文度和途径对发展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曾几何时,问津经贸、财税、金融、工科院校者寥寥,更不要说旅游、海事等等的,尔今它们成了热门专业学科。这说明人才分流要有分流渠道,而这正是起步伊始的市场经济所开掘的。可以设想,今后的各类教育在招生、考试、学制、毕业考核、就业等方面会呈现更大的适应性、多样性、灵活性。

4. 为走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职业模式、生活方式起到开风气作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迫于民族危亡,从陈腐的士大夫集团中冲杀出来,开始了艰苦的奋斗历程。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有人把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五代,对每一代人的心路和作为做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代立足于思想启蒙”、“第二代投身个性解放”、“第三代参与社会改造”、“第四代充满市民情调”、“第五代倾心于文化普及”。建国后知识分子虽几经“折腾”仍为建国兴邦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始终不能摆脱单一计划经济对他们的局限。与历史轨迹相比照,可以说,是新时期赋予知识分子以崭新的历史使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舞台,促使他们构筑新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伴生的求职方向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先贤之中也有提出“实业救国”者,这种口号在当时是“落伍”,用今人之眼光看则是太“超前”(那时何“国”之有?)。而今的儒商,从某种意义上不也是走实业兴邦之路吗?从政、从文到一部分人分流去从“商”,这不仅是知识分子一种结构性变化,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5. 为中国企业家阶层(队伍)的养成提供了主渠道。说到“企业家”,引用笔者曾于1988年发表的拙文中的一段话:严格说来,现时的中国只有厂长、经理而没有域外先进经济大国那种含义上的企业家(这既包括社会给他们提供的自由度,也包含他们自身的素质程度)。这也难怪谁人,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之中,尚没有真正的“企业”,何来“正宗”的企业家?时过境迁,但是,其中讲到的造就企业家的两个总体条件,大致还是不离谱的。社会提供了“自由度”,从基本理论上、宏观政策上应该说解决了;至于“自身的素质”,儒商当是佼佼者。企业家是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智慧型的管理家。尽管知识并不等于智慧,但前者是基础。知识可能转化为对现时事物的综合分析,对前人实践的把握,对理论的深入理解,对外来文化的整合能力,而这些都是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求其皆备不现实,而缺知少识则万难成为“企业家”。这里不能不提及,有少数并无高学历的人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而步入儒商行列。

商海浮沉,大浪淘沙。儒商们面临严峻考验。目前两种体制仍处于胶着状态,市场行为尚不规范,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干扰着经济活动,儒商们盼望并促进“要赚钱靠胡来”的蒙昧状态尽快结束,但谈何容易。由于清高和迂执会有人“回头是岸”。坚持者在实践中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也是个艰难过程。当下,如何身体力行并带动全社会把单纯谋取物质财富的冲动升华为社会责任感,把畸形消费、贪图享受引向追求生活意义生命价值,把以“炒”为荣的重商主义意识转为富民强国的实业精神,把“只有损人才能利己”的非理性变成人己互惠的社会正

义,这需要胆识、韧性和智慧。这是人们期望于儒商的。

“单少则平,积多则神”。尽管儒商现象刚起势,但是容以发展、待以时日,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涵义的儒商一词,可能消失而进入辞典了。而今日之儒商就将成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先进分子,为后人所铭记。

以上,我如此“抬举”儒商,称赞“分流”,并没有丝毫忽视、调侃坚持职守的知识分子之意,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不仅令人起敬,更是传承文化的脊梁,事实上分流从“商”的人总归是一部分。我之所以作如上论,还是基于这样一种“士”的感慨:十年浩劫,“老九”下放,是不是一种“分流”?与今日之分流相较,彼系被迫的,此乃自觉的;彼系破坏文化的,此乃出新文化的;彼系社会倒退的,此乃历史进步的。尊敬的读者,以为然否?

完稿于1995年2月10日上午 家中

责任编辑:王 颖

---

## 读《医学社会学》

非常有幸能在海外读到周浩礼、胡继春先生主编的《医学社会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医学社会学是北美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每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以及有关的私人公司都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来专门资助这方面的学术及应用研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把人的健康问题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像北美许多医学社会学的专著一样,周浩礼和胡继春先生首先在该书中对医学社会学的定义及研究范围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其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广泛吸收了国外关于医学社会学定义的成果,将医学社会学定义为“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的交互作用以及医学领域与整个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同时,作者又未将医学社会学的定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它的对象和范围随着时间与研究的进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又是一个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与作用的过程。

医学社会学的科学定义为全书的结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浩礼、胡继春先生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

医生、护士、病人三者的关系,同时他们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医院组织对全民医疗保健的影响。全书读后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本人深深地感到,他们所探讨的医学社会学中的这些基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医生、护士、病人关系的理顺以及有效的医疗保健制度都会对全民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在本书中还力图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特点,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社会学的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另外,作者还将笔锋指向一些敏感的、特殊的医学社会学问题,如生育控制问题、器官移植问题、性病传播与社会控制问题、安乐死问题等,所有这些特殊的医学社会学问题都非常有意义,然而也一时很难找到普遍能够接受的答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还刚刚起步。周浩礼和胡继春先生的《医学社会学》无疑是这一研究的良好开端。由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社会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才能找到科学的答案。

(林 曾)